



中国为啥会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之谜---四川宽窄科学研究之 12

李君如（中国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Recommended: 王德奎 (Wang Dekui), y-tx@163.com

Abstract: 摘要: 2019年11月1日由中华文化学院主办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术论坛在北京召开，旨在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明根源。本文摘自“观察者”网11月2日刊出李君如教授在论坛的主旨演讲，《从“大道之行”到“人间正道”》中的部分精彩内容。李君如，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47年生，上海市人。197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政史系，1981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进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曾任上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央党校副校长。

[李君如. 中国为啥会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之谜---四川宽窄科学研究之 12. *Academ Arena* 2020;12(2):156-159].
ISSN 1553-992X (print); ISSN 2158-771X (online).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6.
doi:[10.7537/marsaaj120220.06](https://doi.org/10.7537/marsaaj120220.06).

Keywords: 关键词：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之谜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本来就是中国社会规律发展的必然结论。但是，我们知道，这里讲的“社会主义”指的是两个欧洲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于是，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三个问题就成为我们研究中国道路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

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

认识来自于实践。毫无疑问，中国社会主义进程中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在实践中发生，也只能在实践中解决。而实践主体的文化背景和实践环境的文化特质，对实践的走向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古代中国人的“大道之行”思想及其揭示的中国文化的“天下为公”密码，对于中国人接受、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极其紧密的关联。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有自己社会理想的民族。在《礼记·礼运》中，早就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大同”。这部著作，许多专家认为，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它反映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但是，书中提出的“大同”思想，对历代政治家都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大同”，指的是尧舜时代“公

天下”的社会。后来，许多思想家把这种对过去的怀旧，转化为对未来的追求。比如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的《大同书》，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最后实现的是“大同”；而且，这样的“大同”不仅是中国的“大同”，还是世界的“大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以“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已经成为这个民族最高的社会理想，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正因为中华民族有这样的追求，有这样的文化基因，所以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特别能够接受这样的社会理想。比如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最早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中国的留学生，是保皇党人梁启超，是同盟会元老朱执信、宋教仁等人。

这些人虽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观点，作为论证他们自己政治主张的依据，但他们都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就在于他们都是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都是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人。

至于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民族追求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我们说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追求，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时，不仅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而且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宣传阐述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的问题怎么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提出到现在，不到40年时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解决好诸如此类问题，归根到底，要靠我们的实践和智慧。同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等思想，也可以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进程中的问题，和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在西方，但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揭示和反映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因此它和中华文明并不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文明。

我们注意到，由于中华文明秉持的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和西方思想界在马克思主义之前认为自然界有规律、社会发展没有规律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而和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和社会发展都有规律可循是一致的；中华文明强调的“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等“实学”传统和崇尚的易学、阴阳学说等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更有许多相通之处。

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而简单地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能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由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这是我最后要强调指出的。

编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为何近代落后于世界？席泽宗（1927-2008）院士认为是政策制定出现的失误——2007年7月25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该报记者李怀宇写的采访报道《中国科学不发达不能都怨老祖宗》一文，其中李怀宇问：“2前

些年，你发表了不同意杨振宁提出的《周易》影响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提法，认为把中国没有出现近代科学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犯了文化决定论的错误？”席泽宗院士的解释回答是：“科学不发达是跟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有关系，不能找孔子、孟子。从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科学发达不发达还是社会条件，不是一下子就找到几千年前老祖宗的关系。科学发达跟政策有关系”——我们从清朝开始，第一个就是康熙，跟当时的欧洲比，就不行了。后来乾隆是跟华盛顿同一个时期，华盛顿就绝对不做第二任总统。华盛顿在领导人制度是有跨时代意义，现在美国即使领导人改变，也不会造成政治上的动荡。在华盛顿的时代，我们中国正在大搞文字狱。再后来是慈禧太后，这跟明治是同一个时期，日本当时的状态跟我们是一样，明治改良了，我们没有，最后一代都没有改良。所以中国科学不发达，不要去找孔子啊、孟子啊什么的原因。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的战争不断，八年抗战，十年“文革”，多少年的时间都浪费了，对科学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杨振宁说中国科学不发达，跟《周易》有关系，现在科学界有几个人看《周易》呢？没有人看的。

席泽宗：1927年生，山西垣曲人。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51年席泽宗从中山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1955年席泽宗发表《古新星新表》，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引起美苏两国的重视。从1958年起，席泽宗协助叶企孙负责《中国天文学史》的编撰和组织工作，然而书稿从1959年起不断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被修改。1965年席泽宗发表的《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被美国《科学》杂志转载了，“文革”中遭到挨斗。1999年10月12日席泽宗院士发表的《清代中国科学为何落后于世界》一文中说：西方学者的学问工作，由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产生了力学定律、化学定律，出了许多新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给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而我们这三百年做学问上，虽然有了了不起的学者顾炎武和阎若璩做引导，但只有两部《皇清经解》可以拿出手来，做为清代治学的成绩。双方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顾炎武（1613~1682年）、阎若璩（1636~1704年）活跃于清初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1661，1662~1722）。

拿这79年与明末的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一落千丈。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

“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1）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2）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3）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4）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5）屠本峻《闽中海错疏》（1596年）；（6）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7）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8）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9）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年）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陈美东说的灿烂群星中，徐光启（1562~1633年）是一位代表人物。正如袁翰青先生所指出的，“他在科学方面他多方面地融汇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一身兼任了科学工作的组织者、宣传者和实践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是，徐光启和培根去世后，中英两国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1644年是个转折点——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又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清军入关以后，所面临的正是恩格斯所说的这种情况。第一位统治者顺治在位18年（1644~1661年）期间，忙于征战，烧杀抢掠，全国人口锐减，生产大大下降。第二位统治者康熙如果继续按照这条残酷的镇压路线走下去，则势必不能长治久安，他只得适应征服后存在的较高的经济、文化情况，迅速汉化，而在不断汉化的过程中又要防范汉人，这一民族矛盾就决定了他在信任远道而来的传教士方面，有时超过汉族大臣。通过这一背景来看康熙，他的许多政策措施就会得到较为客观的认识。

康熙皇帝1654年生于北京，即顺治定都北京后10年。8岁时，父亲顺治去世，继承了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康熙，在一些年长的大臣辅佐下，成了清代的第二个皇帝。14岁亲政以后，立即果断地清除了辅政大臣鳌拜，废除了奴隶主法权，使满族彻底转变到封建制的轨道上来，安定了社会，巩固了政权，开辟了“康雍乾”三代鼎盛的局面，并平反了南怀仁等的错案，从而赢得了“英明”、“伟大”的荣誉。但是在他执政的61年间，我们找不出

像徐光启这样一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像《本草纲目》、《律学新说》等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著作，有人拿康熙末年（1713~1722年）组织编写的《律历渊源》100卷来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和编译《崇祯历书》来比，而且认为“后来居上”，这个说法似乎欠妥。

笛卡儿在1637年建立了坐标和解析几何学；牛顿（1665）和莱布尼茨（1684）完成了微积分。恰恰是这两项最重要、最新的成果、但在清朝1723年出版的《数理精蕴》中毫无反映，我们可以把责任推在传教士身上；但符号代数没有反映，康熙本人就要承担责任了——1712年夏天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1665~1741）写了一篇《阿尔热巴拉（代数）新法》，向康熙皇帝介绍符号代数，康熙看了以后，觉得“晦涩”，比旧法“更难”、“可笑”，就把这门新科学的传播给扼杀了。直到1859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1815~1887）合译棣么甘（A.DeMorgan）的《代数学》（1835年），这门新科学才又重新来到中国，但延滞了将近150年。

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明末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是在中国士大夫、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自发进行的，皇帝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康熙时期情况却不同，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很大兴趣，而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少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容易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射。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兴趣，那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受到挫折。相比之下，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可能发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洪流，而这种发展趋势却被明清易代所中断。”

为了“窒塞民智”，和个人的独断独行，康熙又扼杀了另一门新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当巴多明（1665~1741）将他给康熙讲授的人体解剖学讲义用满文和汉文整理成书，并绘图子以说明，准备出版时，康熙立即下令：“此乃特异之书，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巴多明的原稿后来传回欧洲，存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1928年才得以出版。批评康熙科学政策的“失策”，这绝不是苛求于前人——不要说与他同时代的法王路易十四（1661年亲政，1715年去世）和俄国彼得大帝（1689年亲政，1725年去世）相比，康熙在科学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远远落后。就是与100年前的徐光启（1562~1633年）相比，也是落后的。

在理论上徐光启的20字方针，头6个字是“深伦理，明著数”，这里的“伦理”并不是现在的伦理学，而是理论。中国传统科学的一个弱点就是系统性、理论性不强，《康熙几暇格物编》就是如此。在天文学方面，康熙所关心的问题都是一

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于从欧洲传进来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他都未予以重视、进行研究。《数理精蕴》53卷,分上下两编,上编《立纲明体》,下编《分条致用》,似乎系统性、理论性很强。但在上编“数理本原”部分,回溯于河图洛书,正宗归于《周髀算经》,其次才是《几何原本》,而这里的《几何原本》又非利玛窦、徐光启的译本,而是传教士给康熙的进讲本。欧几里得几何在这里被大卸八块,本来的公理演绎体系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康熙对待数学和理论的态度。

康熙最重要的一着是,1705年5月11日召见梅文鼎(1633~1721年),面谈三天,亲授机宜。但梅文鼎后来三番五次地反思说:正当我们的先辈们深信西学中源说,把回归“六经”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时候,西方的科学技术却迈开了前所未有的步伐。直到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1770~1830年)以后,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大门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发现我们自己大大落后了。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并有可能转变成为近代科学。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这一进程。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统一,

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是送上门来的一个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然而由于政策失误,他把这个机会失去了。

参考文献

1. Baidu. <http://www.baidu.com>. 2020.
2. Google. <http://www.google.com>. 2020.
3. Journal of American Science. <http://www.jofamericanscience.org>. 2020.
4. Life Science Journal. <http://www.lifesciencesite.com>. 2020.
5. Marsland Press. <http://www.sciencepub.net>. 2020.
6. Marsland Press. <http://www.sciencepub.org>. 2020.
7.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 2020.
8. Nature and Science. <http://www.sciencepub.net/nature>. 2020.
9.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en.wikipedia.org>. 2020.

2/21/2020